



发掘绍兴宋六陵的罪魁祸首杨珪真迦

裘士雄

杨珪真迦其人

杨珪真迦(生卒年不详),唐兀(西夏,今西北一带)人。杨为其姓,珪真伽为其名,在唐兀语中,系“大宝”之意,又作“杨珪真佳”“杨珪真加”“杨鞏真伽”,《资治通鉴》译名为“嘉木杨喇勒智”,元代文献称其为“永福大师”“永福杨总统”等,张岱则蔑称为“杨髡”。鲁迅把“掘开宋陵”归罪于八合思巴存有误解,杨珪真迦至多是帝师八合思巴的弟子辈属,关系一般,他与当时的总制院使、肥巴国师的弟子桑哥关系倒极为密切。

元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杨珪真迦被元世祖授予江南释教总摄(总统),直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因受桑哥擅权贪腐案的株连而被罢免“总统”之职,横行了15年左右。张岱在《西湖梦寻》中记载:“杨髡沿溪所刻罗汉,皆貌己像,骑狮骑象,侍女皆裸体献花,不一而足……闻杨髡当日住德藏寺,专发古冢,喜与僵尸淫媾。知寺后有宋提举夫人与陆左丞化女,皆以色夭,用水银灌殓。杨命发其冢。”可见,杨珪真迦确系为神人所共愤的历史罪人。

据说,当年怀着对刘汉王朝深仇大恨而揭竿起义的赤眉军攻下咸阳后,有过掘开刘邦之妻吕雉陵寝,发生过辱尸、奸尸的事。平时,人们偶尔听说奸尸这种违反人伦的不道德行为,而杨珪真迦竟“喜与僵尸淫媾”,可谓丧尽天良,不能用“辱尸”“怪癖”“恋尸癖”所能诠释的。他不仅是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而且是耸人听闻的性变态狂魔。而发掘宋六陵则是他天怒人怨的罪恶之一。

宋六陵之由来

宋六陵,当年实际上葬有宋徽宗、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宋理宗和宋度宗七位皇帝,以及北宋哲宗元祐皇后陵在内的七座皇后陵,还有大批文武大臣、后妃的坟冢,但习惯成自然,一直称呼宋六陵至今。

宋六陵在今绍兴富盛镇赵家岙宝山(雾连山)南麓,其实是一方盆地,符合堪舆学说“五音姓利”所谓的利于国音赵姓的择址原则。

宋六陵始建于南宋初年,据嘉泰《会稽志》卷六记载:“绍兴元年(1131)四月十四日,奉隆祐皇太后(北宋哲宗皇后孟氏)遗诰:‘敛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宝贝,权宜就近择地攒殡,候军事宁息,归葬园陵(指河南巩义北宋皇陵)。所制梓宫,取周吾身,勿拘旧制,以为它日迁奉之便’……自四月至六月,甫三十五日而攒宫告成。”

所以,绍兴人多以攒宫作为宋六陵的地名称呼。

挖祖坟是报复的最狠毒招

古往今来,挖祖坟这种陋习在历史上屡屡发生,主要是因为迷信风水的结果,当然,民间的盗墓贼则以淘宝卖钱营生为主。

旧时,人们相信一个家族之所以人财兴旺发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祖坟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乎,建新房应事先请风水先生实地踏看,定出最好的房屋朝向等,并拣定破土动工等吉日良辰。同样,建造阴宅(坟墓)同阳宅(住房)一样,必请堪舆家费神一番。所以,在我国还有堪舆文化,《汉书·艺文志》就载有《堪舆金匱》十四卷。上至皇帝老子,下至平民百姓,还是相当信奉的。像元末明初的刘基(伯温)是帮朱元璋打天下的头号军师,他其实也是堪舆家。

对于皇族而言,他们相信如果祖坟(皇陵)处于龙脉之上,那么,皇族的皇位势必是千秋万

传承古越文化
追踪变迁足迹

代传下去;假使龙脉断了,或者皇陵被挖了,也意味着自己的王朝就要终结。在民间也是这样,结冤家的话,要末将对方案里的灶扒掉,要末将对方的祖坟破坏,这是报复手段中泄愤最狠毒的绝招,是往往用以报复死对头的绝办法。

由此,杨珪真迦挖掘宋六陵的目的非常清楚了,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心理需要,打击他们所反对的赵宋王朝,并置之死地而后快。

挖盗宋六陵得到忽必烈应允

金、元南侵,对赵宋皇陵、贵族墓葬均实施疯狂挖掘、平毁,且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干出这下三滥的事!像宋六陵,绝不是杨珪真迦带领一帮人,在“月黑风高夜”,“带着镐头、凿子、锤子、铁刀等工具”盗墓。

南宋端宗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即公元1276年,元朝大军压境,围攻临安,毫无实力反抗的南宋小朝廷只好奉表称臣。此时的南宋,虽有赵昀、赵昺二王的海上行朝,但主体已经灭亡,赵宋流亡政权颠沛流离到端溪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即1279年在广东崖山覆亡。

元世祖忽必烈也知道挖宋室赵氏祖坟的行为和蒙古帝国所倡导道德价值观是不相符合的,但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权衡利弊,还是决断从精神、政治、文化、心理诸方面打击、消除赵宋遗存的影响,于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就“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即总统),掌释教。”忽必烈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非常尊崇藏传佛教,重用该教的高僧,封八思巴为帝师,统率全国佛教,其弟子杨珪真迦(怜真加加瓦)则委派为江南释教总统,统率江南一带佛教,藏传佛教僧人则通过宗教活动报效元廷。忽必烈统一天下、巩固政治,藏传佛教是主要宗教助力。挖掘、平毁宋六陵,杨珪真迦秉承了忽必烈的旨意,他是卖力的执行者。

经黄宗羲、万斯同等人考证,杨珪真迦发掘宋六陵的时间在“戊寅”,即1278年,也就是南宋都城陷落后的第三年,南宋崖山覆亡的前一年,局势还是有些混乱。他忠实地执行了元世祖的旨意和政策。

首先,杨珪真迦利用蒙古汗国和元廷的淫威和所带人马的优势,用暴力驱逐守宋六陵的官吏和军士。虽然南宋王朝已大势所去,彻底覆亡在即,但守卫和管理宋六陵的守陵使罗铣仍忠于职守,坚守在岗位上。当杨珪真迦带领大批元军装束的人马涌进宋六陵时,他挺身而出,为赵宋王朝的尊严据理力争,这帮人蛮不讲理,立即动粗,以拳脚相加,还拔出刀剑相威胁,可怜罗铣无异是螳臂当车,结果是受辱“恸哭而去”,手下那些军士亦只好各自逃命。

排除罗铣等人的阻拦后,在演福寺允泽、天衣寺福闻等几个佛教界败类的协助下,杨珪真迦督阵指挥,发掘宋六陵这种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发掘、平毁皇陵事件是明目张胆地进行的。

他们平毁了100余座帝陵、后陵及一批嫔妃、大臣的坟墓。第一次是八月,发掘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等陵;第二次十一月,发掘了

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墓。他们这样做,除了上述所讲的政治目的外,就是攫取陵墓中的金银财宝。

宋六陵攒殡浅埋,方便了盗墓贼

宋六陵和河南巩义北宋皇陵相比,要简陋得多。如宋六陵玄宫附于上宫献殿之后,以龟头覆之,在墓室之上没有建筑巍峨的陵台坟丘;整个宋六陵没有神墙及四出门;陵墓虽有上下宫,但无石刻群(即石像生);没有左右对称矗立的乳台所形成的乳门;下宫门殿及东西廊之配置,亦颇简陋;通往地宫亦无隧道、羨门。

宋六陵陵墓和其他墓葬如此浅埋、简陋,原本出于赵宋王朝他日迁葬便利的考虑,却为杨珪真迦一伙掘陵墓淘宝提供了方便。尽管宋哲宗皇后孟氏亦有“择近地攒殡”、陪葬品亦从简的遗诰,但毕竟是一朝天子下葬,殉葬品一直被杨珪真迦盯牢不放,确实是大有收获的。据《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记载:“有杨珪真加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论也。”

宋六陵是规模较大的陵区,被杨珪真迦一伙掠夺大批金银财宝外,还有徽宗陵的“马乌玉笔箱”“铜凉拔锈管”、高宗陵的“真珠戏马鞍”、光宗陵的“交加百齿梳”“香骨案”、理宗陵的“伏虎枕”“穿云琴”“金猫睛”、度宗陵的“玉色藤丝盘”“鱼景琼扇柄”等珍品。史载宋神宗永穆陵“所藏尤厚”,所有宝物被劫走,连他的头顶骨也被割去,被番僧当作饮器,行酒作乐,肆意侮辱。

宋六陵遭遇发人深省

杨珪真迦对宋六陵的破坏,是我国历代皇陵中遭遇最凄惨、损失最惨重的。他们对宋六陵的破坏,激起当时广大民众特别是越地人民的极大义愤。先有南宋看守宋六陵的官吏罗铣对杨珪真迦之流的严词斥责和竭力阻拦抗争;当宋神宗被割去头顶骨后,他又买棺制衣成殓,“大恸垂绝,乡里皆为之感泣”。后有山阴义士王英孙不忍赵宋皇帝遗骸弃之于荒野,遂邀义士唐珏、林景熙等四人密谋,冒死潜入陵寝用羊骨调换陵中真骸,分别藏于石匣,秘埋于兰亭天章寺前,其上植有冬青树为标记,史称“冬青五义士”。

宋元之际周密在《癸辛杂识》、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三《发宋陵寝》、叶子奇在《草木子》卷三上《谈艺篇》、明代袁宏道在《宋六陵记》、文征明在《双义祠记》和《明史·危素传》等著录中,在颂扬罗铣和唐珏等五义士的同时,均对杨珪真迦之流那种神人共愤的罪恶有深刻的揭露、愤怒的控诉和强烈的谴责。杨珪真迦这位丧尽天良、泯灭人性、罪孽深重的妖僧、色魔、盗墓贼,必将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林升咏《题临安邸》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国力羸弱,又不进取,没有吸取北宋灭亡的惨痛教训,对外屈服投降,对内残害岳飞等爱国志士,达官显贵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南宋亡国亦势在必行。宋六陵在宋元鼎革之际的如此遭遇结局,令人唏嘘不已,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警示,发人深省!